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本質的策略，策略的本質與解釋的策略

The Strategy of Essential, the Essential of Strategy and the Strategy for Explanation

doi:10.6752/JCS.200509_(1).0005

文化研究, (1), 2005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 2005

作者/Author : 黃錦樹(Kim-Chew Ng)

頁數/Page : 131-135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2005/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0509_\(1\).0005](http://dx.doi.org/10.6752/JCS.200509_(1).0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批評與回應
Commentary and Reply

本質的策略，策略的本質 與解釋的策略

黃錦樹*

收稿日期：2005年4月2日

* 黃錦樹，國立暨南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通訊地址：545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1號

電子信箱：Kcng@ncnu.edu.tw

文
化
研
究

2005.9
No.1

文化研究 創刊號， 2005年9月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Sept. 2005. No.1: 131-135



蕭阿勤先生屢經修改、在不同地方的研討會（澳洲、日本、台北）宣讀過的論文〈台灣文學的本土化典範：歷史敘事、策略的本質主義與國家暴力〉¹是很有勇氣的嘗試。我不知道在不同地域的研討會中得到過怎樣的回饋，但似乎題目也歷經調動，譬如最新的《文化研究》的版本，較激進的「國家暴力」就改成了軟綿綿的「國家權力」，弔詭的在文本的身體上留下了彈孔。

蕭君近幾年的系列論文藉由知識社會學的批判立場，尖銳的審理了1970、80年代以來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形成，²碰觸的是當代台灣學術的敏感部位——無可避免的涉及相關知識社群中諸多行動者「昨是今非」的（屢次）**轉向或覺醒**（最著者如本土大老葉石濤）、以及行動者**覺醒**後對過去言行之解釋上的**事後追認**（如笠詩社），³也隱然指向台灣「跨越語言的一代」（戰爭世代）在複雜歷史境遇裡複雜多變的生存與言談策略。在「從中國到台灣」的**本土論線性敘事**⁴裡，就該社群（包含許多個不同世代的本土論社群）之普遍接受彼輩美麗島事件後的覺醒，那顯然昨日之是非或表態，都不過是（也只能是）一種（不得不的）偽裝或**策略**。如此而建構的**本土自我**，在它**如是**之前，必然有著曲折曖昧的過去，它的歷史，或**史前史**，一個富含雜質的灰暗鬱悶的過去（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充份捕捉了這種複雜度），被遮蔽以致不能正常發育的種籽或根芽。在彼輩的解釋策略上，是一種**剝除與淨化**（去除雜質）的操作程序，或被籠統的稱做去殖民，發現「真正的歷史」（其間包含著諸多解釋技術的操作）；因而本土自我的構造，總是包含了對台灣（**真**）本土（及**台灣性**）的發現，常伴隨著對中國性（源於對流亡國民政府的恨）的去除，且以悲情、受苦、怨恨為其動力，即使在歷史情境改變之後，仍不改其「志之所之」。這樣的主體構造、**主詞位置**，在封閉平滑的線性敘事裡，歷史的斷裂點早已被縫補，皺褶被熨平，以貫徹其主線因果的目的論。

¹ 這版本收入廖炳惠、黃英哲、吳介民、吳叡人編，《重理想像共同體——國家、族群、敘述 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行政院文建會，2004），頁195-230。關於此文宣讀的資訊，見文後的說明。

² 詳蕭文後所列考書目。

³ 蕭阿勤，1999，〈1980年代以來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以「臺灣（民族）文學」為主的分析〉，《臺灣社會學研究》3期，頁1-51。

⁴ 「重理想像共同體」研討會及論文集裡阮美慧的〈從「中國」到「台灣」——台灣戰後詩中的「國家」意象〉即是一典型的例子。

這種主體構造（可以濃縮為一個句子：安怎做正港e台灣人？⁵），弔詭的重複了日據時代台灣人（尤其是戰爭世代）皇民自我的構造（如何成為日本人）。從幾個皇民文學標本之認同敘事（諸如周金波〈志願兵〉、陳火泉〈道〉、王昶雄的〈奔流〉）來看，皇民主體的煉成是該類「如何成為日本人」⁶的敘事中角色唯一的選擇，從本島我提煉成皇民我，一種淨化的程序；「志願兵」作為跨越血際界限的特許狀，可以彌平日台差異。日台不平等問題不再被理解為是殖民統治下的歧視，而是在一種同化主義的封閉視野裡被理解為是不純（雜質的存在，譬如台人日語的本島口音，日常生活的習慣非日本化），於是淨化成為必然的途徑。⁷作為無限支應的認同代價，極致的淨化竟是奉獻出他的全部，他的死。而奔赴戰場的志願兵，乃是奔赴向死亡的主詞，向死而存在之大道上亢奮的皇民，向天皇的超驗之域獻祭。⁸這是戰爭世代——跨語世代的共同經歷，⁹經歷了那樣的生，也經歷了那樣的死——皇民主體伴隨日本的戰敗、殖民統治的結束而死去（被殺死），一如表徵它的存在的主詞也隨著日語在公域的被禁絕而死去，但也因語言的轉換而扭曲重生。這也許是「跨語」蘊含的幽深意味。漢語主詞成了「我」的面具。

這樣的主詞／主體，80年代以後進入新的煉成，朝向創鑄中的台灣國民主體／台語主詞。但曖昧的是，那卻是以被殖民經驗為絕對區隔，一如殖民者後裔的藤井省三不無曲學阿世之嫌的斷言，「『大東亞戰爭』時期的台灣，順著戰爭的進行，而誕

⁵ 國民黨政府統治台灣期間，在其中華文化傳統之重新發明的歷程中，自然也包含了中國主體之煉成，是為台灣的再中國化。一樣可以濃縮為一個句子：如何成為中國人？其中對於殖民污染的淨化，也是主要的程序。

⁶ 借個宗教學的比喻，日本人佔據的是「先天」的位子，本島人則是「後天」。先天生而有，因為係選民，血統純正；後天必須經歷重重考驗及付出種種代價，去除雜質。

⁷ 當代台灣民族主體構造，依來台先後切分先天／後天，被淨化／排除的對象，從外省人到外籍新娘及其子女。和皇民之源於天皇的恩賜不同，這回正當性來於土地，是為土地之子（bumiputera）。其實非常接近馬來西亞國民建構中的馬來人政權之土著／非土著的切分，竊佔了原住民的位子，藉以排斥或審查後來者。呂秀蓮副總統幾度自詡「有遠見」的呼籲山地原住民移民到中南美洲去開墾，是前述「淨化」意識的直白表達。而非如反對者所言，是嘴巴和大腦之間的短路。淨空，佔據，把我類納入土著範疇。一如在馬來西亞，但真正的原住民大部分仍住在山區，被資本主義體系排擠至貧窮邊緣，而真正在政治經濟上佔盡便宜的是受完整現代教育的新興知識分子，貴族子弟，受種族政權扶植起來暴富的土著資本家。但論述上，華人卻是永恆的剝削者，其間不論階級貧富差異，都帶著剝削者的「原罪」。

⁸ 討論見劉紀憲《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頁233-269（麥田，2004）第八章〈從「不同」到「同一」——台灣皇民主體之「心」的改造〉。

⁹ 這部分我接受藤井省三的推斷，「大約有六百萬的台灣人，幾乎都經歷過送別家人、親戚、友人、戀人們上戰場的體驗。」因此皇民文學不只是戰時的宣傳文學，更再現了台人的戰爭體驗，「可說是將六百萬台灣人所共有的未曾有過的戰爭經驗，加以論說化的產物。」（〈「大東亞戰爭」時期的台灣皇民主體文學〉氏著《台灣文學這一百年》，麥田，2004:79）

生的公眾，卻主體的擔負起所謂台灣皇民文學的『文化』建設，而形成台灣民族主義。」¹⁰被本土派少壯代表人物之一的游勝冠認可為「立足於客觀的台灣歷史事實」¹¹的籐井的斷言，很顯然刻意省略或模糊掉那是處於最嚴酷的被殖民情境（戰時動員體制）；而如果有所謂的民族想像，其想像的也不過是皇民共同體（一種馴服的奴隸共同體）；所謂的在台日人與台人合作創造的「文化上的台灣民族主義」，不過是一種戰時動員下的集體痙攣，法西斯亢奮。籐井斷言的被認可，是不是也道出了，那個新造、或拼裝改造的台灣民族主體，那新的集體想像，也在重演一種血祭召喚、犧牲獻祭，向高高的某處、向某個超越者、向著未來的某個決斷時刻？

但也源於未來之不可知，惟過去可以映鑑當下。而過去，本質（當下的信仰）總在事後被詮釋為策略，是為**策略的本質**；真正的「本質」還需看另一個當下現實的需求，待覺醒而後追溯、辨識、發現。故而一切的本質都只能是暫時的，換言之，策略的。但行動者怎麼可能（愚蠢到）坦言那是策略的？他反而必須信誓旦旦的說那是他獨一無二的信仰。¹²**因為策略如同本質，都屬於事後的認知，屬於事後的範疇。**同屬戰爭世代的岩里政男的對應不同歷史情境而呈現的差異背反的**證道之路**（皇民、共產主義者知識青年、國民黨大官、台獨精神領袖）便是活生生的案例，是高招還是賤招，¹³端看解釋者是信徒還是敵人。這既反映了台灣人心靈歷史的複雜曲折、認同之路的崎嶇波折，更呈現出在「識時務者為俊傑」邏輯被認可的當下現實裡，知識社會學的取徑必定難以討好，因為它適足以洞悉本質主義者的偽裝及遁詞。

於是那樣的民族敘事不免帶著證道故事的色彩，召喚信仰者，辨識敵人，檢測愛「我」所愛（台灣或愛中國）與否。這都帶著宗教色彩。哪容得對話與詮釋循環？意義封閉，一種充滿暴力的激情，以文學的論爭為民族文學獨立戰爭的象徵戰場。從葉石濤、彭瑞金到游勝冠等的大量寫作中，都不難辨識到這種意趣。長期以來以被（國

¹⁰ 《台灣文學這一百年》，頁83。

¹¹ 游勝冠，〈做有歷史基礎的台灣文學研究〉，《自由副刊》2004年9月3日。

¹² 因此表現得如同教條主義者。但教條主義者之稱謂如同本質主義者，都會被當事人認為是在指控。也沒有人會自認是教條主義者。據我所知，本土陣營自由主義傾向的邱貴芬教授是少數承認採取策略本質主義（以建構其「台灣性」）的論述者，詳其〈後殖民之外——尋找台灣文學的「台灣性」〉氏著《後殖民及其外》，（麥田，2003:135）。當然，教條主義者在兩個對立的民族主義陣營都有著名的代表，也各自召喚不同的國家暴力——無限上綱的「愛國」恐嚇可以視為其癡狀顯現。

¹³ 這兩天（4/4、4/5）台聯黨主席之興高采烈的到日本靖國神社參拜，應是一與迫害者認同、皇民主體自我確認的指標性事件。

家暴力) 壓迫的情境為其論述的合理化依據, 並沒有因為2000年後政權易主, 弱勢論述事實上已一躍為主流論述而改變相關論述, 陷於不斷革命論、與被迫害者認同而重複了迫害者的邏輯, 文學場域仍然無法從權力場中取得更大的自主性。以台灣文學所為大本營, 「本土論典範」指導之下, 確實構造出新興的常態科學社群, 不斷重述既有的受傷者敘事。這大概可說是台灣文學領域的「主流民意」吧? 相較之下, 左統的台灣史解釋容或雄辯有力(以國共內戰的延長賽及中西冷戰架構的大框架), 但邊疆文學論或特區文學論的文學史解釋, 卻和本土論一樣, 成了民族、政治認同意識型態的附庸。

然而「本土化典範為何在文學領域引起遠較其它領域嚴重的爭論衝突、為何文學領域中的這個議題與族群和民族主義認同政治的關係遠比其它領域更為密切?」(論文前言) 蕭阿勤以敘事認同及世界觀衝突來解釋他的提問, 也詳細列出了台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的「台灣文學」敘事模式, 但也許仍可以就文學作品來做一點補充。

相關的論述者在論證台灣文學從殖民地抵抗文學走向台灣鄉土文學(葉石濤)、台灣民族文學(彭瑞金)其實都以特殊視角收納了台灣史、台灣文化史為其墊背, 文學被想像成一個具總體性的象徵戰場, 包含了一切——不只歷史整體, 還包含了想像的過去。另一方面, 寫實主義大河小說(從鍾肇政、李喬到東方白的三部曲家族史篇幅龐大的小說)及各長短篇也充份發揮它敘事認同的功能——虛構與寫實的雙重性——一方面是發揮文學的虛構功能, 可以比實證史學更自由的開展烏托邦向度, 及形形色色主觀想像的歷史情境與細節, 以歷史為舞台; 另一方面又以形式寫實主義的逼真效果, 訴諸素樸的經驗主義(生活世界的相似細節, 祖輩的共同記憶)驗證它的真實性。就憑藉那種無暇置疑文學自身的文學, 獨斷的反映著某群小知識份子想像的、投射的現實, 以信仰為基礎, 共同創造出以土地、鄉村、族群為基本成份的被壓迫共同體。這是虛構敘事起碼的烏托邦功能。這裡可以看出何以民族主義者(不論是本土派還是中國民族主義者)均獨鍾寫實主義——寫實主義的真正好處是, 明明是虛構, 卻宣稱它是真實的——如實再現。它從不自我質疑。故而如羅蘭·巴特所言, 文學之構造如同神話, 世俗的意識型態載體。